

# 王国维:应张謇之邀任南通师范教习

□都 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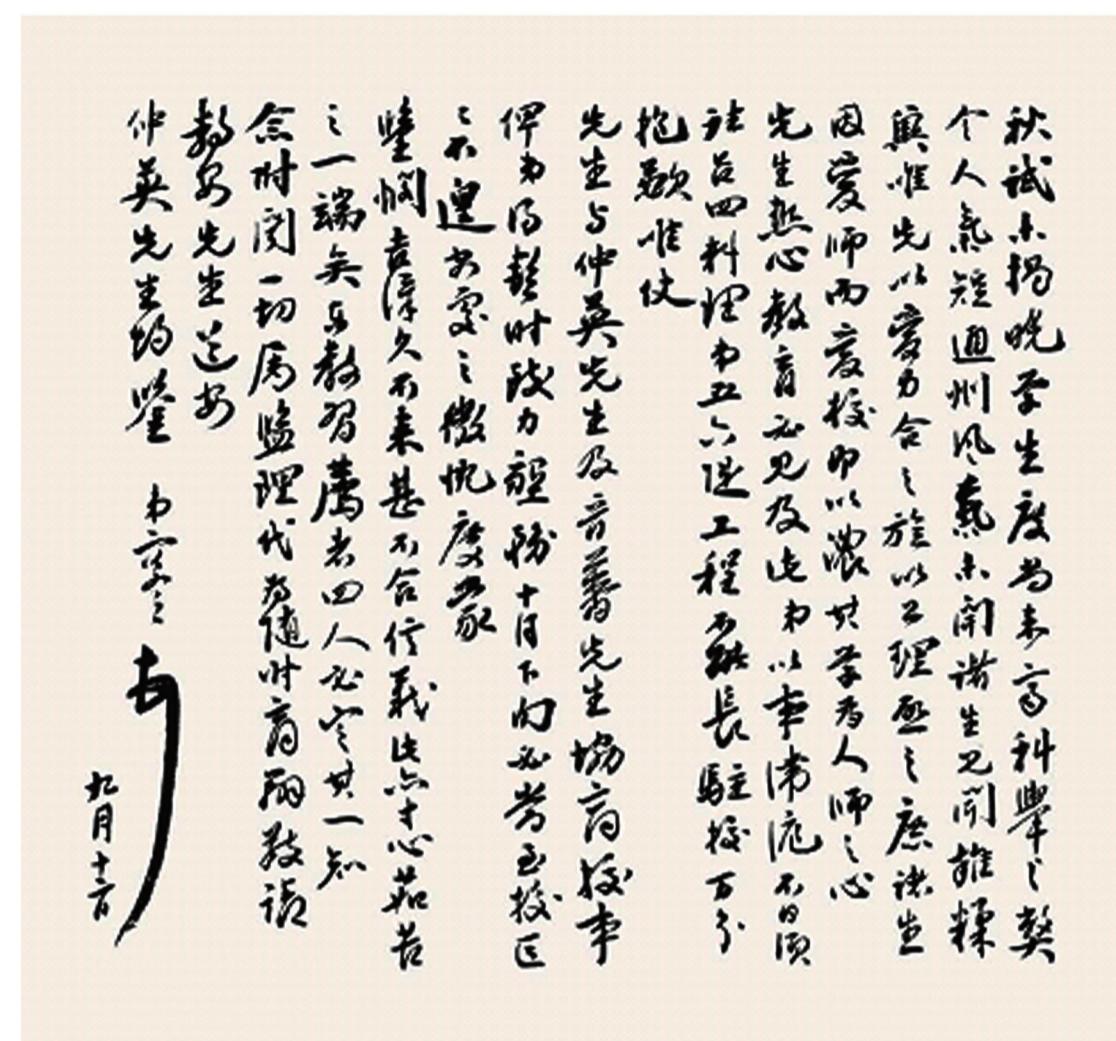
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浙江嘉兴人。中国近现代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造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1902年,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创建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通州民立师范学校(即南通师范)。王国维被特聘为教习,并参与学校创建与管理工作,从而与南通师范及南通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

作为中国最早的师范学校,南通师范创办时在国内无现成经验可循。在上海和东京接受过新学教育并积累有初步学校管理经验的王国维,成为张謇开办师范的重要助手,在审定章程、拟订课程、选聘教习、布置教学场所、审查教学讲义、招生考试和开学开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张謇《教育手稿》和《柳西草堂日记》中记载了王国维参与建校的具体情况:光绪二



1903年10月31日,张謇致王国维函影印件

十九年(1903)二月十日,与监理王康寿一同修订学校管理章程稿;十五日,与张謇、王康寿商量讲堂、诵堂布置事宜;三月二十六日,与池文藻、木造高俊、吉泽嘉寿之丞三位教习负责首届师范本科招生复试的监考;四月朔,参加开校典礼;四月二十三日,与王康寿商定教学讲义编排事宜;九月十二日,张謇致函王康寿、王国维,托付校事,并商定“先以爱力合之,旋以公理启之,庶诸生因爱师而爱校,即以浓其学为人师之心”的教育方法;十月,张謇与王康寿、王国维商定增聘日籍教师事宜。

南通师范开校时,王国维任教的课程为“伦理”和“国文典”。伦理课的教学内容包括西洋伦理学和伦理学史,教学讲义选自由王国维翻译、日本元良勇次郎所著《伦理学》和英国西顿·维克所著《西洋伦理学史要》两书。在讲授过程中,王国维整合了西方哲学、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和美学等思想理论和知识概念,对那些刚从“八股文”里挣扎出来的师范生来说,这些课程是真正的思想启蒙。

“国文典”是一门讲授汉语语法和国文文法的课程,这在当时也是一门具有拓荒性质的师范课程。《国文典》尝试

采用西方语法学研究和分析汉语,进而创建汉语语法体系,与光绪二十四年(1888)马建忠所撰《马氏文通》及光绪三十三年(1907)章士钊所著《中等国文典》大同小异。根据王国维的学生顾怡生在课本上的记录,王国维在授课时还指出了《国文典》中存在的一些错误。

此外,在南通师范开校一个多月后的五月,日籍教习木造高俊在学校自杀,吉泽嘉寿之丞亦受此事影响返回日本,又未能及时返通任教,他们所教的日文、算术、理化等课程只能由王国维和担任图画、体操课程的池文藻兼教半年,勉力承担。而相较于其他课程而言,王国维在南通师范教授的“伦理”和“国文典”,是近代以来中国最早在师范学校中开设和教授的两门课程,在师范教育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也确立了其教育家的地位。

在南通师范学校担任教习期间,是王国维诗歌创作一个高潮期。他先后撰写了《读书书中故纸》《端居》《嘲杜鹃》《五月十五夜坐雨赋此》《游通州湖心亭》《六月二十七日宿破石》《秋夜即事》《偶成》《拼飞》《重游狼山寺》《尘劳》《来日》《登狼山支云塔》等诗共18首,他将西方哲学、美学思想融汇于传统诗词之中,清邃渊永、耐人寻味,于幽美的形象

之中抒发哲理,形成其诗歌创作的风格特点。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曾评价说:“30岁以前,王国维分明是一位文学家。”

在此期间,他还翻译了《西洋伦理学史要》《汉文典》,发表了《哲学辨惑》《论教育之宗旨》《汗德像赞》《叔本华像赞》等论文,撰写了《孔子之美育主义》《红楼梦评论》。这些译著和论文在中国最早介绍了欧洲启蒙思想、康德和叔本华哲学以及美学思想,并运用这些思想倡导美育和德智体美四育并举。

1904年1月王国维因病辞去南通师范教习后,与南通师范和南通仍然保持着一定联系。南通师范的校友会杂志在1912年4月第二期刊载了他《人间嗜好之研究》一文,以及《登狼山支云塔》《病中即事》《晓梦》等三首诗;1914年9月第四期又发表了他《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1920年,正在南通担任张謇秘书和南通女子师范教师的陈邦怀,在研究甲骨文期间,为撰写《殷虚书契考释小笺》,数次致信王国维请教有关问题,托购相关书籍。对于这样一位素昧平生的青年后学,当时已有国际影响的王国维虚怀若谷,均亲自作答,不惮烦难代觅图书并赠送相关著作。



## 历史人物

### “阎”于律己话清廉

——听阎廉回忆老党员的故事

□苇航 陈红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阎廉的名字在如皋城内,妇孺皆知。他是一名很有名望的清廉官员。阎廉生于1930年,如皋西乡搬经王家岱人,1947年入伍,1948年入党,后来任如皋教育局局长等职。1951年,江苏省委原书记江渭清来如皋视察,问过阎廉:“什么文化?”他汇报是“简师,未毕业”。正是这位仅仅读了两个月简易师范的阎廉,对于党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的父亲是红十四军的烈士,他的两位叔叔也加入革命队伍。在他们及不少老革命的影响下,阎廉做人为官,都十分“阎”于律己。近日,他不颐養天年,向笔者追述了几件往事。

西乡是如皋红脉的发源地之一。阎廉自幼生活于此,听说过不少革命者的故事。其中一位便是住在朱家庄(搬经向西一里左右)的“丘铜”(即丁正铎,后任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等职)。“丘铜”家是地主,家中比较富有。他从外地读书(如皋师范)回来,思想进步,便和他父亲“摊牌”:“我们家的财富是剥削而来的,应该推行共产主义,将多余的粮食、多余的衣服,都分给农民。如果现在不分,将来我带人回来闹革命。”他的父亲受不了,父子关系就有了隔阂,“丘铜”后来坚定不移地走上革命道路。

还有一位老革命吴体仁,原名石元道,石庄人,早年从事情报工作,后来任无锡人武部政委。他将阎廉看作自己的孩子。20世纪90年代,赋闲在家的阎廉突然接到吴老的电话,让他去无锡聊聊。随后数日,阎廉吃住在吴家。吴老向他讲述了些事情。他早年在如皋中学读书,班上还有几位表现出色的同学,一位姓许,善于演讲,宣传抗日。另外两位是管维霖、范宝璋。抗战时期,吴和许都走上了革命道路。管维霖成为伪如皋日报社社长(笔者注:管有回忆,其间联系甚密,在美籍人的教堂传递情报给共产党),范宝璋即范芷安,摇身一变,成为伪34师副师长。范在如皋没有作太多恶,但是他听从大特务李世群的命令,前往启海围剿时,下令杀死大量群众。虽然范现在回大陆,捐钱捐款,但是历史要一分为二看。我们要坚持党性,客观评价范的人品。阎廉十分佩服他的分析。

还有一位老革命,也是阎廉敬佩的,那就是他在如皋的老领导季一先。1983年9月25日,阎廉前往南京开会。会议结束,下午四点左右,他前往西康路35号看望老领导季一先。恰逢周末,主人留饭。饭前,季一先的妈妈,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和阎廉“打招呼”:“我是八十几岁的人了,早上不知晚上的事。我唯一的孙子在武汉(插队去的武汉),我不放心,请你对一先说说,我要求他把我的孙子调到南京来当工人。”饭后,阎廉向季一先转达了老人的心愿。季一先收起笑容,严肃地说:“孩子大了,让他走自己的路,何必都要调到自己身边呢?”季一先的神态与回话,至今令阎廉难忘。季老时为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省人事厅厅长。他拒绝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谋私利,无愧于党员的称号。

阎廉本人也很廉政。他任教育局局长时,有县委主要领导打电话给他,因为某老师的丈夫调入城内任职如皋肉联厂的领导,请他尽快将某老师也调入城内学校。阎廉直接拒绝,表示局里刚刚开过党组会,决定今年年内不再调动任何一位老师进城。过后一周,那位领导再次打来电话,催办此事,阎廉再次拒绝,表示等到暑假,统一办理。

阎廉还主动为有困难的老师安排工作。前往某乡督导,他无意听说一位有水平的奚华老师早在抗战时期,任职根据地小学老师。因为出身不好,几次运动下来,公办老师改民办老师,民办老师改代课老师,文革中被解雇,回家当农民。阎廉回到城里,立即调来档案核实,随后恢复奚华的离休待遇。后来年过古稀的奚华老师,拎着一小壶豆油和十二个鸡蛋,登门拜谢。阎廉平日不接收礼品,别人请客他从不去,他也不请人吃饭。但是面对奚老,破例买菜做饭招待老人。老人告别,他又送上两盒豆奶粉、两包脆饼,和五元人民币。他还嘱咐老人保重身体。老人感动得忽然跪下。阎廉连忙扶起他,他说:“我不是向你下跪,我是向党下跪。我已是一把老骨头,党对我这样好……”

丁正铎、吴体仁、季一先、阎廉的老干部事迹,告诉我们,党员清廉从己做起,必为后人学习与传颂。

##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 1955年南通脊髓灰质炎流行

□程太和



1955年夏,南通地区暴发脊髓灰质炎疫情,千余人染病后瘫痪,数百人死亡,其中多为儿童。由于当时没有靠谱的预防手段,这个传染病很快就引起了恐慌。在当时炎热的季节,多数人家竟然关门大吉,没有人家敢让孩子外出玩耍。

脊髓灰质炎是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临床表现主要以发热、上呼吸道症状、肢体疼痛为主(最初症状类似感冒)。病毒主要侵犯人体脊髓灰质前角的灰、白质部分,对灰质造成永久性损害,出现肢体迟缓性麻痹。部分患者可发生迟缓性神经麻痹并留下瘫痪后遗症,一般多见于5岁以下小儿,故俗称“小儿麻痹症”。据《南通市志》及相关资料记载,南通地区脊髓灰质

炎历年呈散在发生,1955—1964年发病率波动在0.66—1.55每万人之间,其中以1955年、1957年、1964年病人较多,均为1.55每万人。1965年至1969年,脊髓灰质炎发病率下降到1每万人以下,1970年又回升至1.33每万人。1973年至1980年,脊髓灰质炎发病率均在0.1每万人以下(其中,1977、1978两年无病例报告),1981年以来均无病例发生。

现在人们再也没听说谁家孩子得了

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是不是这个病自然消失了呢?当然不是!这是我国病毒学家们经过漫长的医学探索和病毒反复缠斗最终胜利的结果。热播剧《理想照耀中国》第15集《希望的方舟》,讲的就是顾方舟(1926—2019)带领中国病毒学家团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研发出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故事。顾方舟是我国组织培养口服活疫苗开拓者之一,一颗小小糖丸成为几代中国人的记忆。

# 通州的“围海造田史”

□王士明



南通,旧称通州,是一块从大海中升起的神奇的土地,位于长江入海口北岸,其成陆于唐代。最初为片状岛屿,古称胡逗洲,与海安、如皋等夹江相望,另有南布洲、长沙东社洲等沙洲,随着长江北岸沙洲不断淤积延伸,最后并入北岸。通州滨江临海,农田一直遭受逆风恶浪的侵袭,通州人民在与风浪的搏击中,不仅没有后退,还勇于进击,向大海要田地,其围海造田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

唐代大历年间(770年左右),淮南节度判官李承有鉴于“海潮漫为咸卤,伤稼害民”,奏请筑捍海堰,借以“遮护民田,屏蔽盐灶”。朝廷允其所请,乃自楚州(旧指淮安府一带)盐城筑堰,直抵扬

州(属海陵),使海潮不得侵淫为害。时长一百六七十里,实为后来范堤的北段。北宋天圣初年(1023),范仲淹出任泰州西溪盐官,见“风潮泛滥,淹没田产,毁坏亭灶”,人民流离失所,乃向淮南盐运使张纶提出建议,请求重修通、海、泰三州捍海堰。张纶认为向当朝申请,得到许可。于是便在天圣二年(1024)征调民夫四万余人,开工重修捍海堰,并采纳范仲淹的方案,经三年施工,至天圣五年(1027)春,新堤告竣,长一百四十多里,外盐内稼,使过去堤外咸卤之地逐渐成为良田。由于范仲淹在重修捍海堰中贡献最大,因此人们将这条长堤称“范公堤”。范公堤的建成,使已有的田地不受海潮侵蚀,堤外增加了不少良田,巩固、发展了围海造田的成果。

继范仲淹后,经狄遵礼、沈起、赵伯昌、史雍泰、包拯等陆续修筑各条新堤,使通州的围海造田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到了清代,还

先后增筑了十八总至双墩、五总埠至二弯、二弯至谢家渡、谢家渡至弯头镇,弯头镇至七排头的海堤,围造了不少良田。1914年,张謇为兴办大有晋公司,开放“金陵荡”,自九门闸经恒兴、环本、海晏、东余抵鲜花港兴工修筑海堤,全长31.65公里。从1915年冬到1917年春,在恒新区、海晏区、东余区、晋南区的东边,张謇组织民工锹挖肩挑筑海堤13.524公里(堤高1.5米至3米不等,堤面宽3.6米至6米,底宽12米至16.5米),围垦了大片良田。后来把这两处海堤称之为“张公堤”。1945年秋,在环本民主政府的组织、推动下,由原三余中学校长陆自成任环本围垦委员会主任,带领近两万民工,奋战了一年,到1946年秋,筑海堤11公里,围起了2.17万亩土地。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又多次组织民工对海堤培修加固,以增强防汛抗潮能力,并随着海堤不断东移,兴办进堤工程。1964年,拦海筑堤5.5公里,围了南片

7200亩,称“海防农场”。1970年11月,拦海筑堤11.73公里,围了北片9775亩,改称“海防公社”。当年,笔者也参加了这次围海造田的劳动,“宿舍”便是建在张公堤上的“环洞舍”。1974年,拦海筑堤0.75公里,围了东北喇叭口三角洲一段1200亩。连同河道、涵闸等项工程,国家投资181万元。在已围垦的土地上,建了13个村,有农民1560户,5000多人,耕地面积17200多亩,其中成熟可进行种植的达10690亩,1983年时皮棉亩产达164斤,位居全县上游。以后,在上述三次围垦的地球上建立了海丰乡,这一个乡完全是围海造田的成果。通州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围海造田的脚步。2006年7月14日,通州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滨海工业园区(今通州湾的一部分),于2007年10月开始再次围垦海洋滩涂。2008年4月30日,海洋滩涂围垦工程(南区)主堤龙口成功合龙,全长7.66公里,横卧在团结闸至北盐场纳潮涵洞、滨海工业园区东侧的海滩上,增加土地1万余亩。